

20世纪上半叶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世界之展开*

刘亦师

提要 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田园城市思想,随即在英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城市规划运动并波及世界,引发了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至今的田园城市运动,影响至今不衰。欧美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程度及实践情况各不相同:苏联采用独特的居住区规划理论建造集合住宅,放弃了田园城市式住区的设计方法,但卫星城理论成为苏联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非洲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田园城市运动因与殖民政政策密切契合,得到大力推展,但其本质与霍华德所提倡的社会改革背向而驰;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汲引田园城市运动的技术手段和设计方法,在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大规模建造城郊田园住区;中国则因工业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较低,仅进行了零星和局部的尝试,但已反映出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深刻认识,二战以后的城市规划方案中明显体现了其影响。只有系统考察了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才能加深理解田园城市思想随着这一运动的进行而发生的调整、变更和接受等过程,以及田园城市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展开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 田园城市;城郊田园住区;非西方;殖民政策;规划思想史

A Study on the Garden City Movement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U Yishi

Abstract: Ever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898, Howard's "garden city" thesis has been shaping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both in the UK and beyond. The extent of its acceptance and relevant practice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vary from one to another. The Soviet Union replaced garden city design with the theories of Sotsgorod and micro-district, but the concepts of satellite city and green belt have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Moscow's city plan since 1918. In Africa and Palestine, the garden city movement was used as an instrument for racial segregation, the cornerstone of European colonial policy in this region, but in diametrical opposition to Howard's social ideas. As a late-comer of capitalist nation, Japan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technical side of the garden city movement, and applied it both in the Japanese islands and colonies in Taiwan, Korea and Manchuria. Due to low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only sporadic practices of garden suburbs emerg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nevertheless they demonstrated Chinese planners' good knowledge of the idea and the attempt to explore social reform with Howard's "garden city" concept as well as make post-war city plans on this basis.

Keywords: garden city; garden suburb; non-Western; colonial policy;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ity planning

田园城市(Garden City)思想是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在《明天:通向真正改良的和平之路》(Howard, 1898)一书中提出的理论体系:在自愿、自助和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新城,并在新城周边设置农业带和城市的绿化体系等,其目的是限制城市的无序扩张,而实现“寓乡于市、寓工于农”,并进而在更大区域上形成级差有序的田园城市组群(social cities),希望以此彻底改变当时英国空间结构和分配方式(图1)。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为基础、以英国为发源地,一场声势浩大、最终深刻改造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田园城市运动迅即拉开了序幕。

但由于霍华德本人并无建筑专业背景,这为建筑师和规划师介入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田园城市运动的发展方向埋下伏笔(刘亦师,2017)。全世界第一处田园城市莱彻沃斯(Letchworth)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由恩翁(Raymond Unwin, 1863—1940)和帕克(Barry Parker, 1867—1947)承担,曲折蜿蜒、变化丰富的街景以及精心设计的独幢住宅成为田园城市设计的“标签”。这一设计手法较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更加易为业主(开发商和政府)所接受,也因此成为田园城市运动的媒介迅速扩及世界各地,遵循恩翁式设计原则的较小规模的优美住区代替霍华德改造社会的宏大愿景,成为田园城市运动的主要目标。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902013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9)02-0109-10

作者简介

刘亦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liuyishi@tsinghua.edu.cn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史视角下的北京现代建筑历史研究(1949—1966)(项目批准号:51778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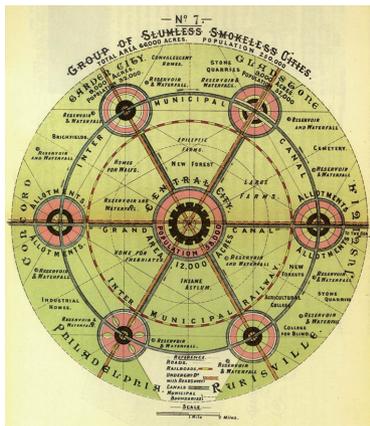


图1 霍华德“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 图示

Fig 1 Paradigm of Social Cities in Howard's book
资料来源: E. Howard, 1898.

整体而言, 田园城市运动既是将田园城市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 也是不断修订、完善和扩充田园城市思想的过程。关于田园城市在欧美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既有文献所载纂详 (Culpin, 1913; Buder, 1990; Ward, 2004), 但其在非西方世界的情况则无论中外文献均少涉及。然而, 田园城市运动是伴随着思想、技术、人员和价值观的全球传播而开展一场国际性运动, 只有全面地考察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才能反映这一运动的全貌, 基于这一广阔背景的比较研究才更有利凸显田园城市运动在某一国或地区的特征。

因此, 本文基于既有的案例研究, 综述20世纪上半叶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世界——俄国、非洲、中东和远东等地的发展。它们既区别于当时西方国家的田园城市运动, 且相互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别, 反映了田园城市思想在各地所经过的不同的调整、改造和接受等过程, 折射出各地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 能使我们加深理解田园城市思想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 使田园城市运动的全球图景愈显丰满

1 沙俄/苏联的田园城市思想传播与田园城市运动

1.1 沙俄时期的田园城市运动

霍华德曾向流亡伦敦的俄国无政府

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1921) 当面请教新城建设的问题, 后者所提倡的合作主义和区域观点对霍华德形成其田园城市思想影响很大 (Hardy, 1991)。

俄国知识界于1912年翻译出版了《田园城市》, 霍华德曾为之作序, 随后成立了俄国田园城市协会 (Buder, 1990: 134)。当时俄国的大城市周边零星开发的城郊田园住区以普罗佐卢福卡 (Prozorovka) 住区较为著名。它位莫斯科西南, 是为铁路公司雇员修建的新住区, 由一条铁路将之与莫斯科相连, 其规划师与霍华德相识并曾在恩翁的事务所工作 (Stern, 2013) (图2)。该项目占地广大达688hm² (1700英亩), 其中约一半面积用于住宅, 绿化程度很高。独幢住宅均为单层或二层, 采取多种建筑平面和风格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但这一住区仅有居住功能, 从一开始就摒弃了霍华德“寓工于农”的思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俄国田园城市协会无力再推进建设活动, 并于1918年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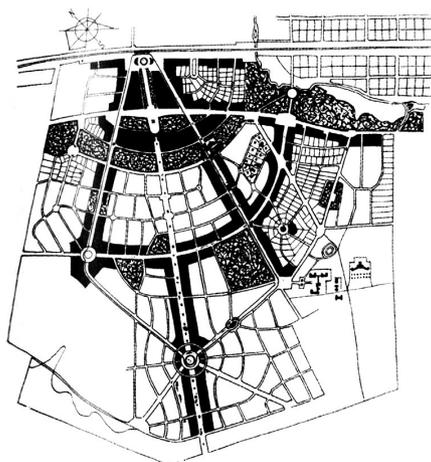


图2 普罗佐卢福卡总平面图
Fig 2 Master plan of Prozorovka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 2013.

1.2 苏联时期的田园城市运动及其式微

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公有制, 这与田园城市思想破除土地私有的根本诉求一致, 田园城市运动一度颇有席卷全苏联之势。1922年, 早先被解散的田园城市协会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重新成立, 开始在莫斯科规划中引入

绿化隔离带等田园城市的设计原则, 并围绕莫斯科开始建设新的城郊田园住区。

在这一背景下, 曾主持改造克林姆林宫的建筑师马科夫尼科夫 (Nikolai Markovnikov) 于1923年规划了莫斯科西北郊的索科尔住区 (Sokol)。该项目占地约60hm², 采用单层或二层的独幢住宅, 居民多为政府高级职员 (图3)。由于占地颇小, 完全没有考虑工业。这一项目因耗资大、容积率低而被苏联政府和规划界批判为“造成了巨大浪费”, 独幢住宅也反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情调”而顾罔当时的经济水平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者理想中的住宅不应是独门独户, 而应该是公社式的住房” (库拉科娃, 2017), 此后苏联的住宅区遂为4、5层的公寓楼所主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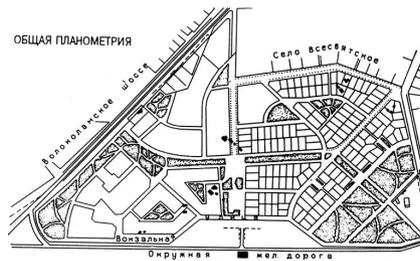


图3 索科尔住宅区总平面图
Fig.3 Master plan of Sokol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 2013.

虽然田园城市式独幢住宅的建设戛然而止, 但其思想的若干成分仍绵延体现于苏联的居住区建设和城市规划中。以多层住宅和附属服务设施形成的居住小区在苏联“一五”计划时期被大量兴建, 其设计也是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居住区及其绿化设计的指导原则。此外, 米列廷 (Nicolai Miliutin, 1889—1942) 和拉多夫斯基 (Nicolai Ladovsky, 1881—1941) 分别提出线性城市理论, 用绿化隔离带将交通、生产与居住区及其服务设施分隔开 (图4)。拉多夫斯基还曾在1930年提出结合环状和线性交通的袋形城市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拟定了莫斯科总体规划方案 (图5)。这些都是既往田园城市运动所未见的理论创新, 丰富了田园城市思想和运动的内容。

总之, 从沙俄到苏联时代, 虽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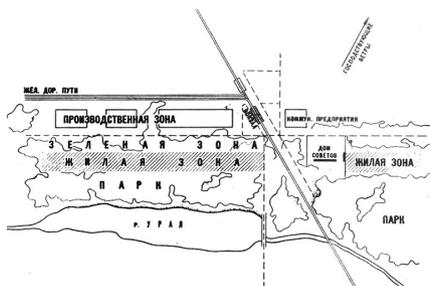


图4 米列廷为阿瓦托斯特雷制定的规划方案
Fig 4 Paradigm of Miliutin's Linear City, 1930.
资料来源: Selim Khan-Magomedov, 1987.



图5 拉多夫斯基的莫斯科总体规划方案
Fig.5 Ladovsky's proposal for Moscow Plan based on Parabolic model
资料来源: Selim Khan-Magomedo, 1987.

郊田园住区未能充分发展,但田园城市思想关于建设充分绿化、环境优美的居住环境和配套附属设施以加强居住空间社会性的理论不断完善,体现在大量居住区的建设中。而田园城市思想中关于绿化隔离带和区域发展思想则深刻影响了苏联城市规划的发展。如1918年莫斯科最初的总体规划就引入环绕绿化带和卫星城理论,1924年又对之进行完善。1930年代初入围的莫斯科总体规划竞标方案也都以环绕主城建设“小田园城市”式的卫星城为发展方向(khan-Magomedov, 1987)。这些规划思想和设计方法在1950年代由苏联专家带到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京“分散集团式”的布局理论。

2 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田园城市思想传播与田园城市运动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田园城市思

想也被英、法等国带到其亚、非殖民地。虽然霍华德式的田园城市未能实现,但公共空间、绿化带、蜿蜒的道路及行道树等都出现在各地城郊田园住区的建设中,成为特定群体居住的“飞地”,尤其在南非和中东的田园城市运动与种族隔离等殖民政策紧密结合,因此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意涵。

2.1 非洲的田园城市运动

非洲最早掀起田园城市运动的是英国殖民地埃及。经营开罗有轨电车的比利时大企业家雇用英国规划师在开罗城郊开发兴建了“太阳城”住区(Heliopolis),时在1905年。这一住区占地近2500hm²。受莱彻沃斯规划的影响,其路网结构由放射状、巴洛克风格的市民中心区和蜿蜒自由的居住区两部分组成。但此处以盈利为目的的新城建设因允许土地出售和转让而造成了投机逐利的现象,与霍华德的本意相悖。其他同时期兴建的“田园城”多位于大城市中心,居民也多为位处上层阶层的外交官、银行家等(图6)。这些建设周边均无农业地带环绕,开发商和规划师把“田园”(garden)的涵义缩略为绿化和附属于住宅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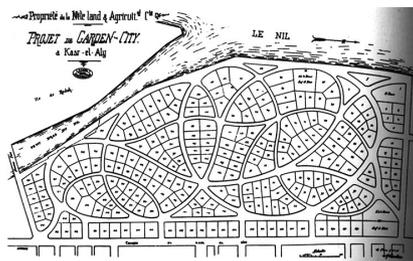


图6 开罗市内的田园城住区(1906年)
Fig 6 A residential project in downtown Cairo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 2013.

20世纪初,田园城市运动兴起之时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调整其殖民政策,从“同化”转而“合作”的时代(Rabinow, 1989)。殖民者为安抚、笼络本土精英阶层,在城市建设上引入欧洲最新的规划技术和流行的建筑样式,并体现出尊重当地文化、使用本土建筑符号等特征,以新德里(1910)的规划和建设最为典型,主持其事的建筑师卢廷斯

(E.D.Lutyens)此前曾参与恩翁等人在伦敦郊区的田园住区设计。类似的,1930年英国在赞比亚(时称罗德西亚,Rhodesia)规划的新首都卢萨卡(Lusaka)同样使用了城市美化和田园城市相结合的规划手法,在居住区中普遍采取了田园城市式的布局 and 建筑样式(Stern, 2013),使非洲田园城市运动的规模扩及城市范围(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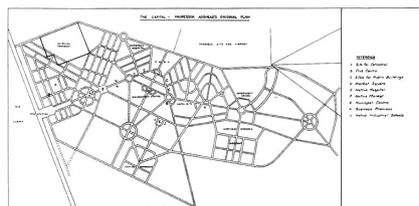


图7 英国规划师为卢萨卡制定的规划方案(1931年)

Fig.7 Planning scheme made for Lusaka, 1931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 2013.

法国在非洲殖民地如摩洛哥等地也掀起了田园城市运动,在大城市郊外也兴建了一批田园住区,从设计原则到建成效果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实践几乎相同^①。这些新建的住区均绿化充分、环境洁净宜人,同时街景蜿蜒优美、建筑形式变化多样,体现了田园城市设计的诸多原则(图8)。但其土地为私人所有,既没有考虑引入工业以就近安置人口,也没有设置环绕的绿化带(更遑论农业地带)以限制其无度扩张。尤其这些住区的居民毫不例外的皆为上层人士甚或针对殖民地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设计,如1921年在英属南非首都开普敦城郊建设的田园住区Pinelands,居民皆为白人。它既是南非的第一处城郊田园住区,也是最早的种族隔离实践之一。法



图8 达喀尔市内的高档住宅区(1910年代)
Fig.8 A high-end residential compound in Dakar in the 1910s.
资料来源: Bigon and Katz, 2014.

国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郊外兴建的新住区同样如此 (Bigon and Katz, 2014)。因此, 非洲的田园城市运动成为殖民政府遂行其殖民政策的技术手段, 从而获得殖民政府的支持而不断发展。

2.2 巴勒斯坦地区的田园城市运动

20世纪之交兴起的犹太复国运动 (Zionism) 是由欧洲的犹太资本家发起、在巴勒斯坦地区²重建“犹太人家园”的运动, 同时也推动了田园城市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开展。新兴城市特拉维夫近郊的住宅和土地被禁止出租或出售给犹太人以外的族群, 其建设与管理成为之后犹太居住点仿效的模板³ (Katz, 1994; 刘亦师, 2016)。由于田园城市思想的很多主张与犹太复国运动的诉求相一致, 如土地公有、兼重农商、合作主义等, 犹太复国运动者提出遵循霍华德的思想建设一座规模更大的田园城市 (图9)。这座城市的空间布局与霍华德书中的图示几乎一致, 同心圆圈层的空间被六等分, 包括中心公园和宽阔的居住区林带。不同的是, 该方案将犹太教堂、犹太学校和受洗堂等宗教建筑安排在中心公园的周边, 而霍华德图中的类似建筑则分散于居住区中。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该方案未能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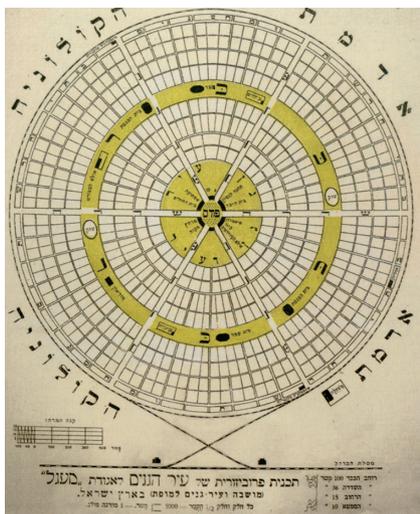


图9 理想的犹太新城总平面图 (1910年代)

Fig.9 Ideal model for Jewish city in the 1910s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 2013.

需要指出的是, 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要义, 并非仅在提供如城郊住区那样良好的居住环境, 也不止步于从经济上整合工业和农业, 而是如《明天》一书中“社会城市” (social cities) 所示那样, 旨在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实现改造英国社会、惠及全民的宏图。然而, 不论是非洲殖民地的城郊田园住区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 遵循的都是种族或民族的“隔离”政策, 将自身与周边环境剥离开来。虽然其内设置了服务设施足以实现自给自足, 但其本质与霍华德整合社会的理想南辕北辙。

3 日本及其殖民地的田园城市思想传播与田园城市运动

3.1 日本对田园城市思想的引介、调适与实践

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内培植财阀, 对外频繁用兵, 日俄战争 (1904—1905年) 胜利后跻身“一等强国”。随着工业的发展, 日本也面临和西方同样的城市问题, 政界和规划家同样将按田园城市思想建设的住区视为“济世良方”。规划史家片木笃将日本的田园城市建设分为3个阶段: ①明治晚期 (1905—1912年), 系统引介英国关于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理论著作, 针对日本的国情加以调整和改造, 并于1919年通过了日本第一部《城市规划法》; ②大正时期 (1912—1925年), 由寡头财阀控制的铁道公司和土地开发公司沿铁道或在在大城市周边进行一系列的城郊田园住区 (日文称“郊外住宅地”) 的开发建设。第三阶段除赓续前期的住区建设外, 日本政府按照卫星城理论主导了更大范围的城市疏散和区域规划, 为世界大战作准备 (片木笃, 2006)。

1905年, 日本内务省翻译了英国建筑师森内特的著作《田园都市的理论与实践》 (Sennett, 1905)。森内特的原作包含大量幅图阐释如何实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 日本将之译为《田园都市》而删略、误读颇多。虽然该书主要反映的是日本政府的农村政策及对知识界要求建设以农业为本的新社区的回应, 理

解多有偏差 (Watanabe, 2004; 渡边俊一, 2000), 但这一概念和名称还是迅速传播开来。此后虽然还出现了“花园都市”“花苑都市”“庭园都市”“山林都市”等多种译名, 但仍以“田园都市”最为允当, 其影响也远及东亚各国。

日本规划师曾奉派考察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并与霍华德和恩翁等人会晤请教, 之后撰写了一批译著和论作。如大屋灵城在1921年考察莱彻沃斯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申明“都市的田园化和田园的都市化”是田园城市运动的理想 (片木笃, 2006); 弓家七郎的著作对我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弓家七郎, 1927)。同时霍华德所主张的合作主义 (co-operativism) 也与日本政府当时所推行以合作自治为主的地方改良运动有相似之处, 受到了更多关注 (曾谕, 2004)。这标志着日本对田园都市理论的引介和传播从最初的片面误解逐渐全面、深刻。

但在追赶列强的心态和国内外政策下, 针对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的国情, 日本规划家们抛弃了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中关于消解大城市、进而重组国家和社会结构的部分, 而主张在以大城市为基础发展工业, 但对其发展加以限定, 并采取技术手段美化城市、改良居住环境 (东秀纪, 2001)。这些主张成为日本1919年《都市计画法》的基础。因此, 田园城市运动中被总结出的设计方法和技术手段, 包括道路系统和道路截面设计、房屋设计和场地布局, 成为当时日本规划界最关心的部分, 进而模仿西方模式建造城郊田园住区。“而城市的形态、规模及土地权属等问题尚未进入其视野, ……他们也没有动力去区分田园城市和城郊田园住区的差异。” (Watanabe, 2004)

由于莱彻沃斯和一大批英国的城郊田园住区都是沿铁道干线修建, 日本的铁道公司也开始效法兴建类似的住宅区。以大阪市为中心的铁道公司巨头在1910年代初就开始建设新居住区使之接近郊野和新建的棒球场及公园, 而涩沢荣一 (1840—1931) 于1918年融资组成了“田园都市株式会社”则沿连接东京

市、郊的东急铁道陆续规划和兴建了一批郊外住宅区(图10)。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东京西南20km的田园调布。其设计没有采取莱彻沃斯那样的直线干道,而取法霍华德的理想图示,以新建的铁道站房为中心放射出3条道路,并环绕布置了若干圈同心半圆的道路,形成独特的空间结构(图11)。田园调布的道路分级明确,采用树形高大俊美的银杏树为行道树。房屋建筑形式多为西式,但开发公司对围墙、高度、建筑密度甚至最低造价均给予限定(Oshima, 1996),因此建筑形式丰富多样但整体和谐。这一实践完整反映了田园城市设计的原则:绿化充分、街道蜿蜒、景观优美、环境卫生,同时对建筑有严格的限定以求整体形象统一。田园调布建成于关东大地震(1923年)发生之后,正值东京市民急切想离开市区另寻住所,田园调布的住宅因此一售而空,在商业上大获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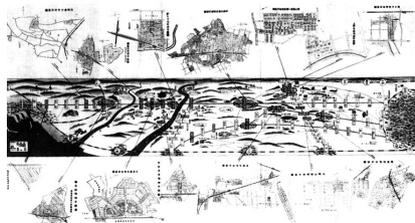


图10 东京至横滨铁道沿线的城郊田园住区(1920年代)

Fig.10 A string of small-sized garden suburb projects along railways from Tokyo in the 1920s
资料来源:片木笃,2006.



图11 田园调布总平面图(1923年)
Fig.11 Master plan of Denenchō fu, 1923
资料来源:Andre Sorensen, 2001.

除铁道公司外,这一时期日本的大土地开发商也进行城郊田园住区的建

设。如明治时代以海产品起家的渡边家族在离东京不远的镰仓市大船站建设了大船田园都市(1923年)。与大船田园都市类似,大船田园都市也公布了11条建筑规则,要求住宅必须采取西式风格、占地不超过地块的1/3,同时对围墙和道路截面的尺寸都做了规定,此外建设了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如下水道系统,并鼓励居民在房屋中安放水槽、抽水马桶和洗衣机等新设备(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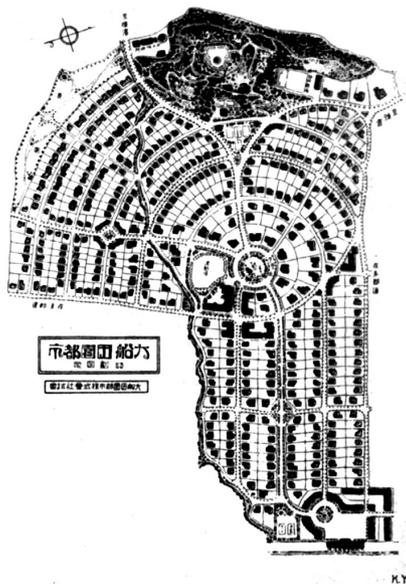


图12 大船町田园都市总图(1923年)
Fig.12 Master plan of Daichiun Dein, 1923
资料来源:片木笃,2006.

1930年代的城郊田园住区也遵循这些设计方法,在空间形式上继续探索。为进行战争准备,日本政府于1939年通过了《防空法》,提出大量建设公园和绿化隔离带并疏散东京等大城市的工业,在更大尺度上体现了霍华德学说的部分思想(图13)。

综观日本的城郊田园住区,遵从恩翁式的田园城市设计原则,旨在为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提供良好环境,迥异于日本的传统居住方式和体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近代化和西方化的进程。但是,这些新住区虽然融合了西方的规划技术和设计方法,却无一涉及“城乡结合、寓工于农”和合作自助(cooperativism)的思想。每处“田园都市”都采取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发公司也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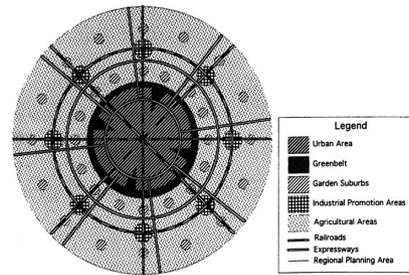


图13 东京都区域结构图(1940年)
Fig.13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of Tokyo, 1940
资料来源:Andre Sorensen, 2001.

与分利,如田园调布在1923年出售时“每坪土地的平均价是原来取得时的8—10倍”(黄世孟,吴旭峰,1991),客观上造成了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旨在消除的土地投机现象,而完成了开发使命的田园都市株式会社更是在1928年被解散^④。

3.2 日本殖民地的田园城市运动

随着日本的殖民扩张,城郊田园住区的建设也被带到台湾、朝鲜和伪满等地,推动这一运动的是朝鲜银行和满铁等日本在殖民地遂行经济剥削的国策机构。

日本在台湾建设了移民村(图14)和公司社宅,也具有类似的性质(黄兰翔,1996),这些土地由日本企业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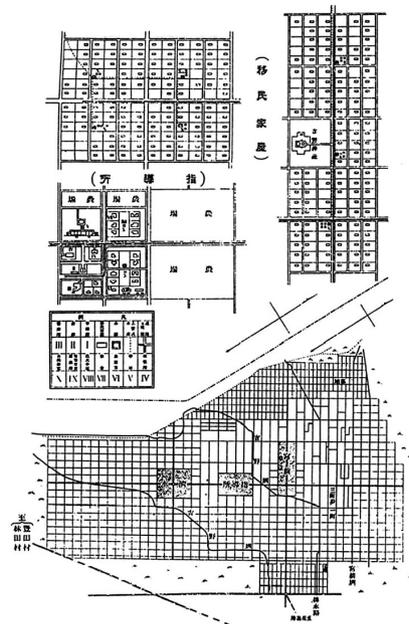


图14 日治时期台湾花莲移民村平面图(1914年)
Fig.14 Master plan of an immigrant village in Hualian, 1914
资料来源:黄兰翔,1996.

房屋则作为一种福利让员工及其家眷居住。与日本国内的郊外住宅不同的是，所有房屋都是统一设计而外观上更一致，也因此相对单调。类似的例子另如位于首尔（时汉城）市中心的朝鲜银行社宅住区，以及沈阳（时称奉天）满铁附属地南端的满铁社宅住区。这些特征与我国五十年代开始建设的单位住宅也颇为类似。

满铁时期，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城市规划，多采取巴洛克式的直线道路加圆形广场为骨架，在某些城市的住宅区中也进行了曲线形道路的探索，如鞍山和抚顺（图15）。这种规划手法，与英国在新德里和卢萨卡等地一样，在市政中心以外的居住区中遵循田园城市的设计原则，但相对规模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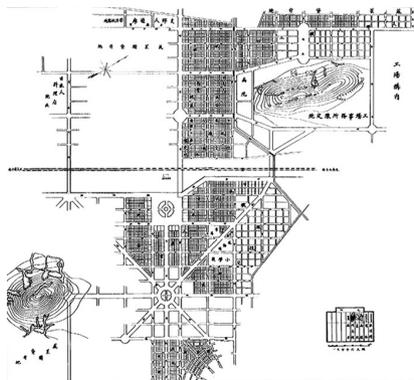


图15 鞍山满铁附属地规划图（1918年）
Fig.15 Plan for a high-end Japanese-ruled railway settlement in Anshan in 1918
资料来源：张复合教授提供。

根据李百浩的研究，伪满时期日本在长春（“新京”）借鉴了当时流行的“邻里单位”规划和建设居住区(李百浩、郭建, 2003)。但将这一思想扩大到整个城市范围的是内田祥三的大同规划。内田祥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建筑师和教育家，曾深入研究过霍华德关于土地权属和土地增值归属的问题，在1919年提出基于公有土地制度的田园城市规划方案（图16）。日本侵占华北后，在大同市“以西计划能拥人口二十万之新市街，并建设附属都市如碳矿都市及工业都市”（大同，1938），并委任内田祥三制定规划方案。内田在区域规划的视野下，根据此前的研究，将邻近老城的外围地

带布置为扇形的邻里单位居住区，居住区间设置了宽广蜿蜒的绿化带。同时，新发展的工业城和碳矿城作为“卫星都市”与主城区分离，并将铁道和火车站铺设在绿化带中，成为有效阻止城市蔓延的屏障（海因，1999）（图17）。内田还提出由政府主持土地收买和开发建设的建议，防止土地投机(内田祥三，1939)。虽然该规划未能实施，但却是田园城市运动在我国及至东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包含了规模仅数十公顷的城郊田园住区所无法涵括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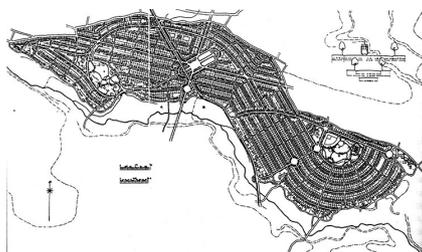


图16 内田祥三提出的居住区模型（1919年）
Fig.16 Uchida's paradigm of a large-scale residential sector in 1919
资料来源：Watanabe,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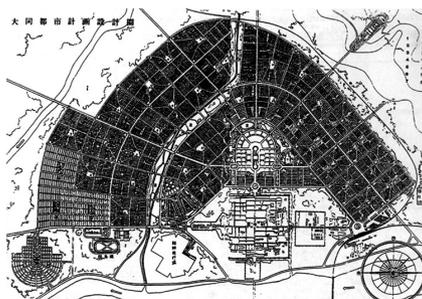


图17 内田祥三大同规划总图（1939年）
Fig.17 Uchida's proposal for Datong Plan in 1939
资料来源：岩崎继生，1939.

4 我国近代时期的田园城市思想传播与田园城市运动

4.1 我国近代时期对田园城市思想的引介与调适

和日本类似，我国近代学者对田园城市学说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渐加深、继而“择善而用”的过程。民国初年田园城市的思想已被介绍到我国^⑤(蔡禹龙, 2017)，孙中山在其用英文撰写的《实业计划》中就曾提议在广州新建“田园

城”（1919）。1920年代以后出现了关于“园市”“花园市”“田园新市”的大量文章和论著，介绍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实践，讨论其在我国如何实行。早期发表于不同刊物的文章篇幅较短，互相间抄录不加考证，常出现误拼英文地名、人名以及疏漏基本的史实等现象。1925年董修甲的长文第一次系统追溯田园城市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特重其“寓乡于市之意”，并论及田园城市运动在各国的推进状况，此后被频繁引用、转录（董修甲，1925）（图18）。但即使此文也未区分田园城市（garden city）与城郊田园住区（garden suburb）的区别，并误以为波恩维尔（Bournville）和森赖特港镇（Port Sunlight）的建成年代晚于莱彻沃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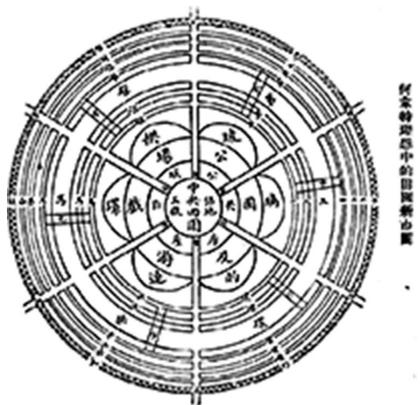


图18 董修甲转译霍华德著作所绘制的田园城市模型（1925年）
Fig.18 Dong Xiujia's elucidation of Garden City theory, redrawn based on Howard's paradigm, 1925
资料来源：董修甲，1925.

1927年张维翰翻译出版了在日本面世不久的《英国田园市》（弓家七郎，1927）一书，书末“田园市运动大观”一节论及田园城市的定义：“不以工商业为目的之单纯的住宅地，以及土地公司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之郊外地，与夫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之土地，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未足称为独立城市者，周围无农业地带者，皆不得谓田园城市。对于此等土地，田园市论家特以田园村（garden village）、卫星市（satellite town）、田园郊外地（garden suburb）、工商业村（industrial village）等名称。”这是对田园城市和相关各种概

念的明确区分,表明当时田园城市的认识已颇全面系统,但尚未论及区域规划以及田园城市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联。1930年张维翰又主持翻译了1905年日本内务省编译的《田园都市》一书(日本内务省地方局编,1930),使这一名词成为我国学界接受的定称。

此后,更多涉及田园城市的论文跳出抄录前人论述和简单罗列史实的窠臼,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历史及田园城市的概念和历史地位均论断精审深刻。如庾锦洪即将西方城市的发展历程粗分为城市规模无限扩张、管理放任自流的“治标时期”,与从规划系统上加以改进的“治本时期”,“此时期治本之都市计划乃接踵辈出,田园城市亦其中之一”(庾锦洪,1937);“花园都市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贴调剂药”(严景珊,1930);“要之即所谓都市农村化、农村都市化二者合并而成为田园都市”(梁汉奇,1930)。1934年的文章《田园都市理想与实施》不但对田园城市和城郊田园新区加以明确分区,更对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书中译为“复合田园都市”)有精辟论述,关注点扩大到区域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分配(体扬,1934)。

为推进田园城市的实施,1930年代的倡议者包括学者、官员、商人和基督教改良运动者,率相以符合个人和国家利益相劝导。原来土地开发仅局限于城内,但若转而将资金用于开发城郊新市区,“再以之分售或出租”,不但为益群众也成为另一投资获利的途径。同时,在当时日本咄咄相逼的局面下,“化整为零,使都市多分化为田园,而国家因得藏富于民……分化之都市即可继之以与敌人相持搏”(张国瑞,1943),成为一种救国方案。抗战爆发后,这种城市疏散的思想与防空和内迁工厂的安置相结合而具有“国防性的军事意义”,成为战时城市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与英国1940年代田园城市思想因空袭疏散而重获关注的情形颇为类似。

二战结束后,建筑和规划界对田园城市思想和实践继续进行讨论,将其作为指导战后城市重建、复兴和发展的规

划理论(郑樑,1942),在区域规划的高度将其融入各市的城市规划中。如梁思成发表于1945年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即指出市容的装饰与点缀(如引入绿化和建造公园)绝非城市规划的全部或主要内容,“而我国将来市镇发展的路径,也必须以‘有机性疏散’为原则”(梁思成,2001)。不惟如此,规划家针对我国的居住习惯和经济水平,对田园城市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做了批判性反思,提出若干校正的原则,如1947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二稿)》中提出:“疏散的办法,在本市是不能采用欧美各国所用的办法的”,不能像西方那样小规模迁移人群和工厂,而需要中央政府调集力量加以实施。又根据调研察知英美的户均人口为3.2—3.5人,而上海则为5.35人,当时“英美每英亩要住20—22户,而我们只要住13.2户。如此,在同等面积中,我们的住宅可比他们少35%,这是我们同英美情形的一个主要不同之点。”此外,人口密度、住宅标准等也按照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4)。

由此可见,我国近代学者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认识经历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早期论述或有常识错误或偏差,但很多论著对田园城市思想的内容、本质、历史地位等均有深刻认识,熟悉正在世界各国发生的这一运动的进展,也明了田园城市与城郊住宅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但在中央权辖有限、工业化水平很低的近代时期,要加以实施则只能“体察要义,自拟计划”,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取舍进行。

4.2 我国近代的田园城市运动实践及其余绪

我国近代的田园城市运动实践多为市内的高档住宅区或城郊田园住区的开发与建设,也有规模更小、社会实验性质的工人新村。孙科曾指出“新式都市之建设,多由大公司或慈善家为之”(孙科,1931),但我国工业化水平低下,缺少日本近代时期那样兼营各种事业的大财阀,也没有围绕某个大城市形成完整的通勤交通体系。由于公、私两方均

缺少强有力的推动和调用资源的能力,我国的田园城市运动规模更小,是更加零星、局部的尝试。

最早的例子是民初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广州。孙中山认为广州兼具深水、高山和平原的地理条件,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将“建一新市街于广州,加以新式设备,专供居住之用”,成为“花园城市”,惜对土地权属和开发方式未加说明(孙中山,2013)。但在此思想指导下,相继担任市长的孙科、林云陔等人集政府之力在1920年代末建设了数片广州“模范住宅区”,提倡卫生的居住环境和与自然相接近的生活方式,“起到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影响”,以梅花村(原名松岗)最为典型(刘兴,1997)。其居民多为由政府官员和留学归来的工商界上流阶层,建筑章程规定每地块住宅建筑占地不超过2/5,余用作花园绿地。

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前,已考虑对南京重做规划,其中之一即拟以鼓楼以北、凤仪门以南的广大地区为新建的“田园都市区”,设置公园和各类文化设施如图书馆、音乐厅等,成为文化居住区,也未提及工商和就业问题(张武,1926)。定都南京后,负责制定南京规划的“首都建设委员会”在制定过程中则通过了由孔祥熙提议的“推广郊外建设采用田园都市计划案”(王俊雄,2002),《首都计划》在政府职员和低收入者居住的公营住宅设计上规定采用田园城市的设计原则(图19)。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较早一处开发的新式住区是由基督教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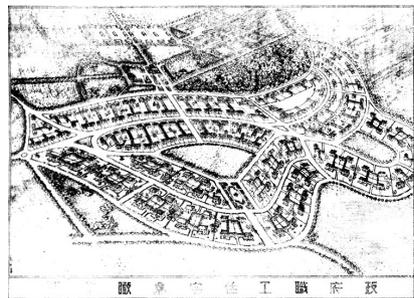


图19 南京公营住宅总图(1929年)

Fig.19 Proposed scheme for public housing sector in Nanking, 1929

资料来源:首都计划,1929。

年会于1925年在陆家嘴建设的一片住宅，占地仅1300m²（5亩8分7厘），围绕服务楼与运动场建成住宅12所，形成“一个劳工新村，改良浦东工人之居住卫生”（董修甲，1937）。此后，美国人开办的普益地产公司购置了紧邻公共租界的7hm²土地，划分为70个地块，委托著名建筑师邬达克（Laszlo Hudec，1893—1958）于1928年设计风格各异西式住宅（《邬达克的家》编委会，2015）。这一项目离城不远，交通便利，且从策划到宣传营销都以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标榜，吸引富庶阶层入住，取得商业成功（图20）。



图20 邬达克设计的哥伦比亚圈地块平面图（1928年）

Fig.20 Hudec's design for Columbia Circle in 1928

资料来源：《邬达克的家》编委会，邬达克的家[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另一处成功实施的新式住宅区是位于上海市区以南10km的蔷薇新村（郑红彬、杨宇亮，2013）。主事者之一、后来力主采用田园城市为法进行战时城市建设的张君瑞记述：“民国22年间，我曾与友人张永年、郭列莹诸氏在上海市县属宁国乡船板蔷薇新村，基地百亩，住宅百数亩，并组织中国新村建设社，专门经营新村事业。在中国自周作人介绍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张后，国人自力大规模实际经营者，以此为嚆矢”（张君瑞，1939）。除新建住宅外，主事者还试图以之推动社会改良。此外，无锡、唐家湾等地也进行了建设城郊新住区的尝试（董修甲，1931；冯江，2014），但这些例子中均未见以新区建设推行土地权属革新的尝试。

抗战之前和战争期间，虽然规划界已认识到田园城市思想中的有机疏散和卫星城理论对城市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

义，但直到战后各大城市的规划方案才将之作为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如制定于1946年《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即以疏散主城区人口为指向，采取卫星城理论在300km²的广大范围内布置了12个卫星市、18个卫星镇，并结合保甲制度以邻里单位理论为基础规划各个居住区（谢璇，2011）。《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工作开始于1946年，开宗明义“对于本市将来人口增加之处理，应从区域计划入手，乃为浅显之事实。然区域之发展，又以区域内各单位之密切联系及有机发展为前提”。对具体居住区也按照田园城市的设计原则加以布置，并根据国情规定人口数量和建筑密度（图21）。



图21 上海闸北西区分区规划总图（1947年）

Fig.21 Master plan for Zhabei district, Shanghai, 1947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4.

显然，1940年代国内规划对于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的认识已相当精审，只是当时兵燹纷乱，根本无力系统实施。但这些规划活动积累了经验，制定方案的专业人员后来大多留在大陆，在1949年之后才真正发挥其长才，在新形势下推动了田园城市在中国的发展。

5 结论

田园城市运动既是将田园城市思想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也是不断修订、完善和扩充田园城市思想的过程：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在运动之初就因便于实施和管理而在诸多方面都被修订，其目的不再是牵动全局的社会改良，而是以建设有益健康、环境良好的城郊田园住区（garden suburb）为首要任务，之后又衍生出卫星城（satellite

town）和新城（new town）理论；毗邻英国的欧洲大陆各国则因应着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蓬勃发展体现出很多不同于英国的特征，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对田园城市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创造，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也体现出巨大差异：埃及、日本和中国等地遵循了城郊田园住区的设计原则，在城市中创造出专属上层社会的优美居住区，而南非、巴勒斯坦等地新建的“田园城”则成为遂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工具，等等。这些离散于主流之外的实践鲜见于西方文献，虽它们大多未能在理论上有所创辟，但都结合了当地情况丰富和发展了田园城市思想。

一种规划思想在发展和指导实践过程中常常背离了其原初的理想，而当它被传播到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地区时，在对其接受前被调适和修改也几乎必然。田园城市思想源出英国，但它在全世界各地传播时受到过各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在实践时则因各地的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实际情形而被修订和调整，出现了以城郊田园住区替代田园城市、用设计方法和规划技术替代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田园城市思想在非西方世界各国的发展轨迹和实践情形各不相同，但这些不同之中蕴藏着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新兴的民族国家如苏联、日本和中国与欧美各国一样，其田园城市运动经历了引介、吸纳和理解这一思想，继之尝试进行应用和实践这两个主要阶段。但在殖民地如印度、埃及与朝鲜、伪满等地，则在殖民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直接移植了西方的范例。

第二，与西方大量兴建、利用铁路通勤、服务于中产甚至工人阶级的城郊田园住区（garden city）不同，非西方国家遵从恩翁式的田园城市原则设计的新建住宅区，其服务对象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特定阶层（如政府职员、工人）或种族，且它们大多毗邻市区而建，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上海的“哥伦比亚圈”，但也有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如开罗。这是受制于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水平低

下的结果。相比之下,苏俄、日本的城郊田园住区布置在近郊铁路和城际铁路沿线更与西方国家相似。

第三,连续、广泛的田园城市运动实践依赖于该国的工业化水平和政府的效能。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形成的大财阀在1920年代成为推动城郊田园住区建设的主要力量,而我国近代规划家虽然深刻理解了田园城市思想并从理论上阐明了应用的意义及步骤,但终究无力加以实施。

第四,各国的政府和业主推行田园城市运动的目的各不相同,如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将其作为实施种族隔离的手段,而日本、中国则以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其共同之点,都代表着近代化的成就,且均造成了与城市其他部分相隔离的“飞地”,丝毫不谋求整个社会的空间结构和分配方式的改进。这些都与霍华德“社会城市”(social cities)的理想背向而驰。

最后,田园城市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设计方法和规划技术是非西方国家关注的重点,因此缺少西方那样由社会经济结构等深层原因推动的理论创新,唯一的例外是苏联时代的若干探索如线性城市理论等。

与当今的全球化趋势类似,作为早期全球化样例的田园城市运动也以思想、技术、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等)的全球传播为特点。相比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的田园城市更重视技术手段和空间形象,从微观的草地、树木、公园、建筑样式,到中观层面的分区制度、道路设计、土地重划,再到宏观层面的城市疏散、区域规划,无一不可以田园城市思想笼括涵盖,并足以显示这些国家近代化事业上的成就,也因此造成了一场席卷非西方世界、声势浩大的田园城市运动,在非西方国家中形成了与传统模式截然不同的一批新型住宅区,使草坪、公园、花园等成为设计标准,在改变城市景观的同时也改变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及其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

对我国近代而言,早期的规划家对田园城市思想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不可因为没有看到

太多实例而产生误解。尤其董修甲早在1925年于比较各国的田园城市运动后即指出:“田园新市之建设,不问其为大规模或小规模,合作者或独创者,其寓乡于市之意如未忘却,则田园新市之精神仍在。凡欲创办田园新市者,不必专效法一国,更不可专效法一种计划,须体察其要义,而自拟适宜之计划。各国田园新市计划中,良者采之,不善者弃之,如此方可得最适宜之制度也”(董修甲,1925)。这种制宜主义的论断开启了我国近代以来汲引西方规划思想而根据国情加以改造的先河,与1958年以后探索我国自己的城市规划道路的思想相一致(华揽洪,2006),是我国近代田园城市运动所留下的另一份精神遗产。

注释

- ① 应注意田园城市运动在法国本土反响颇弱,因法国人倾向大城市生活,在此文化背景中柯布西耶才提出“光辉城市”“3百万人城市”等方案。
- ② 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今天以色列和约旦,一战前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一战结束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
- ③ 特拉维夫扩张速度很快,1920年代初即从原来拉法城外的一处住宅区独立为市。格迪斯曾在1920年代考察该市并制定了规划方案。
- ④ 伴随莱彻沃斯和维林开发而成立的第一和第二田园城市公司至今仍存在并进行城市管理。
- ⑤ 最先向国内介绍田园城市思想是《申报》发表于1912的一篇文章。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BIGON L, KATZ Y. Garden cities and colonial planning[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 Press, 2014.
- [2] BUDER S. Visionaries and planners: the Garden City Movement and the modern commun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CULPIN E. The Garden City movement up-to-date[M]. London: The Garden Cities and 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13.
- [4] HARDY D. From Garden Cities to New Towns: campaigning f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1899-1946[M]. London: E & FN Spon, 1991.
- [5] HOWARD E. 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M].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1898.
- [6] KATZ Y. The extension of Ebenezer Howard's ideas on urbanization outside the British Isles: the example of Palestine[J]. GeoJournal, 1994, 34(4):

- 467-473.
- [7] KHAN-MAGOMEDOV S. Pioneers of Soviet architecture[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 [8] OSHIMA K T. Denenchō fu: building the Garden City in Japan[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1996, 55(2): 140-151.
- [9] RABINOW P.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10] SENNETT A R. Garden C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M]. London: Bemrose and Sons, Limited, 1905.
- [11] SORENSEN A.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12] STERN R, FISHMAN D, TILOVE J. Paradise planned: the garden suburb and the modern city[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2013.
- [13] WARD S. Planning and urban chang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 [14] WATANABE S. The Japanese Garden City[M]// WARD S. Planning and urban chang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 [15] 本书编委会. 郇达克的家[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Editing Board. Hudec's house [M]. Shanghai: Far East Press, 2015.)
- [16] 蔡禹龙. 民国时期国人对“田园城市”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探索[J]. 兰州学刊, 2017(2): 54-62. (CAI Yulong. People'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Garden City in the Republic[J]. Lanzhou Journal, 2017(2): 54-62.)
- [17] 大同·关于大同都市建设之件[R]. 大同市档案馆, 1939. (Datong·on Datong's urban construction[R]. Datong Municipal Archives, 1939.)
- [18] 東秀紀, 等. 「明日の田園都市」への誘い—ハワードの構想に発したその歴史と未来[M]. 东京: 彰国社, 2001. (DON S. The lure of Garden City of Tomorrow[M]. Tokyo: Shokokusha, 2001.)
- [19] 董修甲. 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J]. 东方杂志, 1925, 22(11): 30-44. (DONG Xiujia. Garden City and municipality in China[J]. Dongfang Magazine, 1925, 22(11): 30-44.)
- [20] 董修甲. 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M]//陆丹林. 市政全书. 上海: 道路月刊社, 1931. (DONG, Xiujia. Garden City and Chinese municipality [M]//LU Danl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nicipal works. Shanghai: Roads Press, 1931.)
- [21] 董修甲. 英国的花园都市[J]. 前途杂志, 1937, 5(5): 52. (DONG Xiujia. British Garden Cities[J]. Prospective Magazine, 1937, 5(5): 52.)
- [22] 渡边俊一. 都市计画的诞生[M]. 东京: 柏书房株式会社, 2000. (WATANABE S. The birth of city planning[M]. Tokyo: Po Books Press, 2000.)
- [23] 冯江. 从宗族村落到田园都市: 民国中山模范县的唐家湾实验[J]. 建筑学报, 2014(9+10): 117-122. (FENG Jiang. From lineage village to Garden City: Tangjiawan experiment in Zhongshan model county in the Republic[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4(9+10): 117-122.)
- [24] 弓家七郎. 英国田园市[M]. 张维翰,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GONJIA C. British Garden Cities[M]. ZHANG Weihai, translate. Shanghai:

- Commercial Press, 1927.)
- [25] 华揽洪. 重建中国: 城市规划三十年, 1949—1979[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HUA Lan-hong. Reconstructing China: city planning of 30 years 1949—1979[M]. Beijing: Sanlian, 2006.)
- [26] 黄兰翔. 花莲日本官营移民村初期规划与农宅建筑[J].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 1996, 3(3): 51—90. (HUANG Lanxiang. Initial planning and rural house construction in Hualian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governmental immigration [J]. Academia Sinica, 1996, 3(3): 51—90.)
- [27] 黄世孟, 吴旭峰. 战前日本受西方社会主义规划概念影响之检验——以日本式的“职工村”及“田园都市”为探讨对象[J]. 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 1991(6): 91—101. (HUANG Shimeng, WU Xufeng. An examination of pre-war socialist influence on city planning in Japan[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Studies, 1991(6): 91—101.)
- [28] 卡罗拉·海因. 从几个殖民地城市看日本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M]//张复合, 中国近代建筑师研究与保护(一).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225—230. (HEIN C. Evolution of Japanese planning ideas as exemplified in several colonial cities [M]//ZHANG Fuhe. Study and Preservation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I).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5—230.)
- [29] 库拉科娃. 莫斯科住宅史[M]. 张广翔, 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KURAKOVA, T. A history of housing in Moscow[M]. ZHANG Guangxiang, translat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 [30] 李百浩, 郭建. 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城市规划范型的历史研究[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4): 43—48. (LI Baihao, GUO Jian. A study on patterns of city planning of Japanese-occupied cities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3(4): 43—48.)
- [31] 梁汉奇. 广州市市政公报[J]. 1930(366): 4—22. (LIANG H. Canton municipal bulletin[J]. 1930(366): 4—22.)
- [32] 梁思成. 市镇的体系秩序. 大公报, 1945.8 [M]//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4).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03—306. (LIANG Sicheng. System of town planning. Dagong Newspaper. 1945.8[M]//LIANG Sicheng. Complete works. Beijing: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2001: 303—306.)
- [33] 刘兴. 广州市近代住宅研究——兼论广州市近代居住建筑的开发与建设[J]. 华中建筑, 1997(2): 117—123. (LIU Xing. A study on Canton's modern houses[J]. Huazhong Architecture, 1997(2): 117—123.)
- [34] 刘亦师. 霍华德生平及其田园城市思想与著作版本研究[C]//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7. (LIU Yishi. 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y idea and editions of Howard's books [C]// 2017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Meeting, 2017.)
- [35] 刘亦师. 现代西方六边形规划理论的形成、实践与影响[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3): 78—90. (LIU Yishi. Formation,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modern hexagonal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6(3): 78—90.)
- [36] 内田祥三. 大同の都市計画案に就て(1)[J]. 建筑雜誌, 昭和14年(1939): 1281—1295. (UCHIDA. Preparations for the city plan of Datong (1) [J]. Architectural Magazine, 1939: 1281—1295.)
- [37] 片木笃, 等. 近代日本の郊外住宅地[M]. 东京: 鹿岛出版会, 2006. (BIENMOU Dou. Garden suburb designs in modern[M]. Tokyo: Luodao Press, 2006.)
- [38] 日本内务省地方局. 田园都市[M]. 张维翰, 译. 上海: 华通书局, 1930. (NIPON Naimusho. Garden City [M]. ZHANG Weihuan, translate. Shanghai: Huatong Press, 1930.)
- [39]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 大上海都市计划[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Shanghai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ity Planning (ed.). Greater Shanghai City Plan[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4.)
- [40] 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庶务处. 首都计划[R]. 1929. (City Plan of capital Nanking. Nanjing[R], 1929.)
- [41] 孙科. 都市规划之进境[M]//陆丹林. 市政全书. 上海: 道路月刊社, 1931. (SUN Fo. Progress of city planning[M]//LU Danlin.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nicipal works. Shanghai: Roads Press, 1931.)
- [42] 孙中山. 实业计划[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SUN Yat-sen. Industrial business plan[M]. Beijing: Foreign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3.)
- [43] 体扬. 田园都市的理想与实施[J]. 市政评论, 1934, 2(2): 11—15. (TI Yang. Idea and practice of Garden City[J]. Municipal Review, 1934, 2(2): 11—15.)
- [44] 王俊雄. 国民政府时期南京首都计划之研究[D]. 台南: 台湾成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WANG Junxiong. A study on city planning of capital Nanking in the Republic[D]. Tainan: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Taiwan Cheng Kung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2002.)
- [45] 谢璇. 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 (XIE Xuan. A study on Chongqing's urban construction and City Planning, 1937—1949[D]. Guangzhou: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 [46] 严景珊. 花园都市设计[J]. 国闻周报, 1930, 7(35): 1—6. (YAN Jingshan. Design of Garden Cities[J]. National News Weekly, 1930, 7(35): 1—6.)
- [47] 岩崎继生. 蒙疆の佛都: 大同风土记 [M]. 奉天: 满洲文化普及会, 1939: 82. (IENCHIJII S. Notes on Datong [M]. Mukden: Manchu Cultural Association Press, 1939: 82.)
- [48] 庾锦洪. 田园都市之研究 [J]. 新建筑, 1937(5, 6): 1—18. (YU Jinhong. A study on Garden City [J]. New Architecture, 1937(5, 6): 1—18.)
- [49] 曾谔. 日俄战后日本农村的报德运动[J]. 日本学论坛, 2004(2): 23—27. (ZENG An. Hou-toku movement in the aftermath of Russo-Japanese War in Japanese rural areas[J]. Japan Forum, 2004(2): 23—27.)
- [50] 张国瑞. 战时田园市计划[M]. 桂林: 中国建设出版社, 1943. (ZHANG Guorui. Wartime Garden City plan [M]. Guilin: China Construction Press, 1943.)
- [51] 张国瑞. 战时田园市计划[J]. 建设研究, 1939, 1(6): 58. (ZHANG Guorui. Wartime Garden City plan[J]. Construction Studies, 1939, 1(6): 58.)
- [52] 张武. 改造南京市计划书[M]. 南京: 宜春阁, 1926. (ZHANG Wu. Reconstruction plan of Nanking[M]. Nanjing: Yichun Press, 1926.)
- [53] 郑红彬, 杨宇亮. “魔都”的安居之梦: 民国上海蔷薇园新村研究[J]. 住区, 2013(4): 136—146. (ZHENG Hongbin, YANG Yuliang. A study on Rose Garden in republic Shanghai [J]. Community, 2013(4): 136—146.)
- [54] 郑樾. 战后都市计划导论[M]. 重庆: 中国新建筑社, 1942. (ZHENG Liang. An introduction to post-war city planning [M]. Chongqing: China New Architecture Press, 1942.)

修回: 2019-02